

中日茶文化中的风炉与地炉异同浅析

张建立

摘要:日本茶道用来生火烧水的茶炉有两类。一类被称为“风炉”,一类被称为“地炉”。在很多日本茶道修习者看来,“风炉”虽然沿用了中国茶文化中的称呼,但早已是名存实非。“地炉”则多被视为日本茶人的独创。然而,仔细梳理研读中日相关文献可知,“风炉”与“地炉”,无论是其名称、形状、制造方法,还是其功能及所体现的文化理念等,皆可以溯源至中国文化。毋庸赘言,虽然源自中国,但确实并非对中国文化的照搬照抄,而是增加了很多新的创意,体现了日本茶道吸收中国茶道文化并予以本土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日本茶道;风炉;地炉;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5)02-0090-08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Furo and Hibachi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s

Zhang Jianli

Abstract: In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toves used for starting fire and boiling water, namely, one is wind-hearth (called furo), and the other is sunken hearth (called hibachi). For many practitioners of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although the term "furo" was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tea culture, its essence diverged. The "hibachi" was often regarded as an innovation unique to Japanese tea practitioners. However, a careful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both China and Japan reveals that both the "furo" and the "hibachi", in terms of their names, shapes,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functions, and the cultural philosophies they repres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Chinese culture. It is evident that although these elements originated from China, they were not merely copied; instead, they were adapted with numerous new ideas, reflecting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by way of absorp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tea culture.

Key words: Japanese tea ceremony; the wind hearth; the sunken hearth; localization

日本茶道是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中日茶道文化同源异相,恰似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宏观的中日茶道文化比较研究固然不可少,微观的正本清源亦很重要。风炉与地炉是中日茶道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日式风炉与地炉虽然皆源自中国,但在日本茶道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也凝聚了历代茶人丰富的创意。本文拟通过考察中日两国风炉与地炉在制造方法、形状、功能及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上的异同,在正本清源的同时,亦对日本茶道本土化发展的特征予以简要探讨。

一、中日两国风炉之异同

(一)中日两国风炉在制造方法、形状上的异同

关于风炉,1847年版的日本茶书《茶道筌蹄》“金风炉”条目中记载:“金风炉之始,乃唐物鬼面乳足台子风炉也。由南浦绍明携带回国,从崇福寺传到了大德寺。后来,在应仁之乱时被烧毁。此风炉两侧

张建立,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艺道与日本国民性。

的装饰环原非鬼面,而是凤凰纹样,灰型是押切形。”^{[1]661}一般认为,在镰仓时代(1185—1333)初期,禅僧南浦绍明将点茶台子及配套的茶道具等从中国带回了日本。但是,当时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风炉形制如何,并无明确记载和图示。说到风炉,人们自然会马上想到陆羽在其著作《茶经》“四之器”中列在了首位的“风炉”。虽无图示,文字描述还是比较详尽的。为了便于理解日本茶道风炉的形制特点等,现将《茶经》“四之器”中关于“风炉”的描述抄录如下:

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朽壤。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其三足之间,设三窗。底一窗以为通飙漏炷之所。上并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置埽埽于其内,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样抬之。^{[2]20-21}

与之相对,日本相关文献中,如1892年版《和汉茶志》中关于风炉有如下记载:

土风炉,茶集云运泥炉。按:陆鸿渐茶经,唐人以锻铁炉与竹炉云,及南宋亦然。元至正中,始运泥而造,呼之曰运泥炉是也,古有谓瓦炉者。本邦所谓烧拔炉属欵,然其炉火炽,故至元运泥以为之。其制精,珠光始悟运泥制,而命匠作之,至今传之,云奈良风炉是也。^{[3]33}

综合撰写年代相差悬殊的《茶经》与《和汉茶志》的记述来看,虽然尚不能确定“风炉”是否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日本,但中日两国的风炉在制造方法方面的共通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异之处则多体现在风炉的形状上。现代日本茶道所使用的风炉,从其材质来看,有“唐铜风炉”“铁风炉”以及用土烧制的“土风炉”等;从其形状来看,有“鬼面风炉”“切合风炉”“朝鲜风炉”“琉球风炉”“眉风炉”“透木风炉”“绍鸥风炉”“道安风炉”“四方风炉”等。另外,根据风炉的“火口”“侧环”“足”等各部位的形制,又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形状。

其实,陆羽的风炉不仅没有实物留存下来,而且也没有制作模具和图纸可考,后世只能依据现存《茶经》的文字记录,来推测其具体形状。但不管怎样,《茶经》“四之器”中的风炉,显然是不可能收放在日本茶道所使用的台子里面的。

另外,即使是日本风炉中与《茶经》记载的风炉最为近似的“鬼面风炉”“琉球风炉”“朝鲜风炉”,不仅没有高高突起支撑风炉的三足,而且也没有设置用来接住木炭灰的“灰承”,这一点也是中日风炉结构设计上的最大差异之处。

与中日风炉结构设计上的差异息息相关,中日茶人们对于炭灰的态度及运用,也成为中日两国风炉形制上最为突出的差异。在中国茶道中,灰作为木炭燃尽的渣滓是要废弃掉的。与之相对,在日本茶道中,灰非但不是废弃物,还是茶人非常珍重之物。风炉中的灰还会被制作出很多可供观赏的形状,称之为“灰型”,如“二文字押切”“连绵的远山”等等。而且,因风炉种类不同,其灰型各异。地炉所使用的“湿灰”,则更是需要茶人们在炎热的夏天经过反复多次晾晒等工序制作而成。日本茶人在炎炎烈日下制作“湿灰”的情形,既宛如在炮制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又如同在锤炼一件工艺品。此外,中国茶文献中未见类似日本茶道所使用的“台子”及其配套的风炉等茶道具记载(图1),这也反证了日本茶道风炉在本土化发展



图1 “台子皆具”与风炉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过程中所具有的创新性。

(二)中日两国风炉在功能、文化理念上的异同

关于风炉的功能,在唐代以后文献中,风炉作为吃茶专用道具的记述比较多。杨万里《题张以道上舍寒绿轩》一诗写道:“菊芽伏土糝青粟,杞笋傍根埋紫玉。雷声一夜雨一朝,森然进出如蕨苗。先生饥肠诗作梗,小摘珍芳汲冰井。风炉蟹眼候松声,箴篱亲捞微带生。”^{[4]1579-1580}另外,如《云笈七签》中的“入风炉内火之”等记载显示,在唐宋道教文献中,风炉也被当作炼丹炉^{[5]1591-1592}。与之相对,在日本,与点茶台子同时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风炉,作为吃茶专用道具的功能与中国无异,但未见有作为炼丹炉使用的记载。

另外,支撑作为日本风炉的结构与功能的理念,与中国相比较其差异还是很明确的。《茶经》“四之器”中记录的风炉,明确地将易经与阴阳五行的思想内容雕刻在风炉的足等部位。从陆羽的生平记录等文献来看,主动逃离寺院生活的陆羽应该也是很反感佛教性质的东西的。另一方面,在日本,风炉的足多为很小的乳足,没有空间用来雕刻八卦符号,取而代之的则是在灰型的正中间即相当于炉底放置炭火的地方,画上了一个代表“水”含义的坎卦符号。日本的风炉与陆羽的风炉结构相比,进行了很大的简化处理。风炉的形状整体也作了很多简化处理。当然,这种简化并不是随意的取舍,而是在风炉的功能与思想方面进行了各种创新。

日本茶人不仅仅是汲取了道家思想,而且还添加了佛教的内容,以此来建构日本茶道的精神世界。例如,日本茶道使用的茶炉中有一个叫“五德”的用来撑釜的道具,这是中国茶炉所没有的。这个“五德”究竟起自何时,缘何会有如此称谓,目前依旧没有定论。如《茶道筌蹄》中记载:“往昔是直接将釜悬挂在台子风炉上使用。即便使用土风炉时也是在其上缘两侧垫上叫‘透木’的窄木条,将釜悬挂在‘透木’上使用。从武野绍鸥时代开始,人们才更多地使用‘五德’这个道具,直接将釜悬挂在炉内的五德上使用。”^{[1]661}

日本茶道界一般认为,最初使用“五德”的是武野绍鸥。《松屋会记》弘治二年(1556)三月九日的钵屋又五郎的茶会记载“钓物 五德”,这是记录五德使用情况的最初文献。另外,关于“五德”这个称谓,山田宗遍著《茶道要录》“五德之事”条目中记载:

五德之本字如何,无从知晓。传闻有僧煮茗读书时,将釜悬挂在一个铁轮上来烧水,并一直为不能自由对其进行上下调整而苦恼,于是做了一个挂钩,可以上下自在调节,因而号“自在钩”。刚好其所读书中有“六德”之说,即自在德、炽盛德、端严德、名称德、吉祥德、尊贵德。如今已经有了“自在”,还剩下五德,所以便将这个用来托起釜的铁轮号称“五德”,一个铁轮还附带着三爪。^{[6]52-53}

此类佛教僧侣将用来悬挂釜的铁轮命名为“五德”的说法,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之感,但也恰好反映了日本茶人旨在吸纳佛教思想内容建构日本茶道精神世界的意图。

天正年间(1573-1592)以后,主人在客人面前添炭的茶道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了,木炭灰也不再是废弃物,而是变成茶人们珍重之物,并且做成各类灰型以供欣赏。从一个风炉、二文字押灰型、三爪五德这样一个象数,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道教思想。也就是说,从日本茶人在风炉上的创意,亦不难窥见日本茶道旨在通过风炉建构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世界的意图。

二、中日两国地炉之异同

(一)中日两国地炉在制造方法、形状上的异同

概览中日两国记述地炉的文献可



图2 五德、自在挂钩、风炉灰型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知,地炉的制作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如成书于日本镰仓时代初期的《宇治拾遗物语》“地火炉”条目中所载:“所谓地火炉,挖掘地面而成者。”^{[7]32}即通过在地上挖掘坑穴建造而成,这也是最为通常的做法。现代日本茶道在茶室内固定的地点建造隅炉、向炉、出炉时,所使用的依然是这种方法。另外一种日语称之为“置围炉里”的可移动的地炉。《大德寺文书之三》“一三八七 长芦寺校割账案”中就有“大永五年(1525)十二月十八日(中略)置围炉里一个”^{[8]16}等记载。关于这种移动式地炉,历史相当悠久,同样可以追溯至中国或朝鲜文化,与现代日本茶道修炼点茶时使用的“置地炉”也不尽相同。

很多日本茶道修习者以为地炉是日本茶人独创,但其实地炉不仅非日本茶人独创,而且在地炉的制造方法上,中日两国并无多大区别。例如,宋代欧阳修的《欧阳修全集》中收录了“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这样一首诗。从该诗文题目中的“凿”这个动词可知,欧阳修时代的地炉的制作方法也是掘地而成。同样是宋代文献,如张君房编《云笈七签》“修羽化河车法”中记载:“掘一地炉,深一尺六寸,阔一尺四寸。”^{[5]1727}也是掘地而成。

关于地炉尺寸,中国的文献中记载很少。《欧阳修全集》中收录的“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中称: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谨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规模不盈丈,广狭足容膝。(中略)霜薪吹晶荧,石鼎沸啾唧。披方养丹砂,候节煎秋术。西邻有高士,輶轲卧蓬荜。鹤发善高谈,鲐背便炙熨。披裘屡相就,束缊亦时乞。传经伏生老,爱酒扬雄吃。晨灰暖余杯,夜火爆山栗。无言两忘形,相对或终日。微生慕刚毅,劲强早难屈。自从世俗牵,常恐天性失。^{[9]741}

关于新建“小斋”的空间大小只说是“规模不盈丈,广狭足容膝”,并未明确其具体尺寸大小。这个“小斋”地炉的功能是用来煎茶、熬药、温酒或者是烧烤栗子等,对于地炉的具体尺寸并未做详细记载。因此,如上所列举的道教古典《云笈七签》“修羽化河车法”中对地炉“阔一尺四寸”的记述实在是非常珍贵的记录,对思考日本茶道地炉尺寸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日本茶道所使用的地炉尺寸虽然被统一规定为一尺四寸见方,但该标准具体确立于何时,却无从可考,至少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日本茶道创始初期并未形成统一尺寸。从这些千利休活跃时期的著名茶人的茶会记录来看,地炉的尺寸、茶室空间的大小及釜的大小等,在当时都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表1、表2)。

表1 《宗及做客人的茶会记》中关于“地炉”的记载

日期	茶会记	内容
日本永禄十年(1567)十月一日	钱屋宗仲的早茶会	炉二尺,霰釜,钓用,自在
永禄十一年(1568)十月廿七日	山上宗二的早茶会	宗仲所持之霰釜初次使用,四寸的地炉,有五德支架
永禄十一年(1568)十一月十三日	松原绍通的早茶会	炉四寸,长釜安放于五德支架上
永禄十二年(1569)十一月廿三日	千宗易的早茶会	地炉一尺四寸,姥口平釜
永禄十三年(1570)十一月十六日	纳屋宗久的早茶会	地炉一尺四寸
永禄十三年(1570)十二月四日	宗瓦的早茶会	地炉一尺四寸
元龟二年(1571)十二月七日	纳屋宗久茶会	地炉九寸
天正五年(1577)九月一日	纳屋宗久的茶壶切封茶会	围炉里(一尺四寸)
天正九年(1581)十月十二日	山上宗二的茶会	地炉四寸
天正十年(1582)十二月廿八日	千宗易的早茶会	炉四寸

表格资料来源:(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七卷,日本京都淡交社1977年版,第131-412页^{[10]131-412}。

表2 《宗及做主人的茶会记》中关于“地炉”的记载

日期	茶会记	内容
元龟二年(1571)十月廿一日	早茶会	地炉一尺六寸
元龟二年(1571)霜月廿三日	早茶会	地炉一尺九寸,平釜,钓用
天正五年(1577)十一月廿九日	早茶会	开始使用一尺四寸地炉
天正七年(1579)十月十九日	早上茶壶切封茶会	开炉茶会使用拜领的四寸地炉,姥口釜一个

表格资料来源:(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八卷,日本京都淡交社1977年版,第164-321页^[11]164-321。

关于日本茶道的地炉尺寸标准的确立时期等,在日本茶人奉为茶道圣典的《南方录》中有如下详细的记载:

在武野绍鸥的时代,虽然说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设有地炉,但地炉的尺寸大小尚无统一标准,往往是要根据釜的尺寸大小来决定。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商量后建造了两张榻榻米的茶室,在茶室一隅建造了一个向炉,并依据台子的尺寸规范,确定了地炉的尺寸为一尺四寸。其后,在京都常用的四张半榻榻米茶室中设置了一尺四寸的地炉,在乡下常用的四张半榻榻米茶室中设置了一尺三寸的地炉。^[12]299

草庵的地炉,起初尺寸并不固定,武野绍鸥与千利休经过认真商议决定依据大台子的尺寸规范来整合茶道点茶法,规定向炉一尺四寸。以安放茶道具“长板”的宽度一尺四寸为根本,把安置风炉的一尺四寸见方的空间定为地炉的尺寸。^[12]224

如所周知,在日本茶道研究中,史学界对《南方录》中有关千利休的相关记载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该书内容并未客观反映出千利休的茶风。但是,从后世茶道文献来看,《南方录》的观点还是被其后世的茶人们继承了下来。《茶道筌蹄》记载:“地炉尺寸往古曾为一尺五寸六分,从武野绍鸥时开始确定为一尺四寸,千利休也沿用之,如今茶人依旧沿用这个尺寸。”^[1]661《茶道通解》中则以问答对话的方式记载了地炉尺寸的确定过程,如提问称:“围炉里的尺寸是如何决定的?”回答称:

关于围炉里如前所述,最初是珠光切割榻榻米造地炉用于点茶的,那个时代的地炉尺寸大小是一尺八寸或一尺六七寸见方,故尚无固定的尺寸。后来到了武野绍鸥的时候,才将地炉的尺寸确定为一尺四寸见方。无论是一尺八寸,还是一尺四寸,其理同一也……至于说地炉的尺寸无论一尺四寸还是一尺八寸其理同一,则因有关涉秘事之嫌,故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自古以来的秘传之事,今日似乎有些人也变得无所顾忌,但作为此道中人对古人还是应该心存敬畏才是,所以也就不复赘言了。加之秘传内容极其复杂,仅凭借书本上的内容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各位欲探究秘传之奥旨,还是求教于研究此道造诣深厚的宗匠,认真领悟其教诲,久而久之自会迎刃而解。^[13]71-72

从这些记载可知,日本茶人们一般认为地炉的尺寸标准是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二人商定的。从“依据台子的尺寸规范,确定了地炉的尺寸为一尺四寸”这句话来看,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二人具体是依据来自中国的点茶台子的尺寸规范确定了地炉尺寸为一尺四寸,那也就意味着日本茶道的地炉尺寸可以溯源至中国茶道。换言之,大规矩还是遵照了中国茶道规范,即如《南方录》开篇“觉书”所言,日本茶道是“以台子为根本的”。

(二)中日两国地炉在功能、文化理念上的异同

与主要作为吃茶专用道具的风炉相比,地炉的功能则是非常宽泛的。首先,在中国,地炉最初是作为取暖道具来用的。使用地炉之火温酒、烧烤栗子、烧水点茶、熬药等,则不过是顺便对地炉功能的扩大使用而已,因而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全唐诗》中收录的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谈到了地炉。如《即事重题》写道:“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14]5162《初冬即事呈梦得》写道:“青毡帐暖喜微雪,红

地炉深宜早寒。”^{[14]5194}《初冬早起寄梦得》写道：“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炉温先暖酒，手冷未梳头。早起烟霜白，初寒鸟雀愁。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14]5142}此外，《宋诗钞》中也收录了一些描述地炉的诗，如范成大《三月十九日夜极冷》写道：“谁勒余寒不放回，春深犹暖地炉灰。乡心忽向烛前动，夜雨先从竹里来。鬕髻已如莺百啭，酴醾那复雪千堆。调糜煮药东风老，惭愧茶瓯与酒杯。”^{[15]1533}《次张守韵二首》写道：“促席山堂夜，寒灯吐碎金。酒分邻瓮美，栗爆地炉深。疏懒难堪事，纷华易坏心。自怜贪寸禄，双鬓老侵寻。”^{[15]1533}《冬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写道：“拨雪挑来踏地菰，味如密藕更肥醲。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榾柮无烟雪夜长，地炉煨酒暖如汤。莫嗔老妇无盘钉，笑指灰中芋栗香。煮酒春前腊后蒸，一年长飧瓮头清。尘居何似山居乐，秫米新来禁入城。”^{[15]1803}从上述诗文中的内容来看，地炉从唐代开始就已经被作为日常生活道具来使用了。

与之相对，在日本，地炉的功能与中国并无太大不同。1891年版的《日本社会事汇》“火鉢 火炉”项中，对于日本古典文献中与地炉的由来、功能相关的记载进行了如下汇总：

地炉，盛火之具也。其制作方法不一，形状各异，各类文献记载如下。《和汉三才图会》云：周礼官冢宰之属，宫人凡寝中共炉炭，则炉亦三代之制，今火炉是也。按火炉俗云火鉢也，其制不一，可以御寒可以焙物。（中略）古有地火炉，原本是用于制作食物等，而非用于温暖手足。《续古事谈又后三年记》中称，所谓‘地火炉次’原本主要是指制作食物之事，但在田舍乡村称其为‘围炉里’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在汉土称其为‘地炉’。山谷之诗中有‘地炉相对语离离’，还有用来暖足的‘足炉’。又《一话一言》云，萨摩国伊集院（日置郡）所使用的竹笼火鉢，本是昔日萨摩从朝鲜掳来的陶工所制作，因此其居住村庄皆为李氏。又《贸易备考》记载：火炉俗称火鉢，乃御寒之具也，其制不一，其形状亦各异。^{[16]1516}

从以上记载可知，日本的地炉不仅是起源于中国，而且其功能亦彼此没有多大差异。另外，1893年版的《温古之刊》中对地炉的使用方法也有如下记载：“宝历年间之前每正月七日、十五日这两天，有‘庭围炉里’，具体做法即在内庭新设置地炉（此所谓地火炉）来制作饮食，全家人离开平素的饮食场所，一日三餐皆团坐在新设的炉灶前进行，因而也将此称为‘庭灶’。”^{[17]37}

关于“庭灶”，《日本社会事汇》“庭灶”词条中有如下记载：

正月元日在庭上设置地炉，其傍铺上藁榻榻米，一家团圆在炉边吃着杂煮庆贺新年，人们将这个习俗称之为‘庭灶’。（中略）《新撰字镜》称：炉字训读为地炉。近世之‘庭灶’实乃‘地火炉次’之遗风，也可谓颇类似于唐土的暖炉会。《和训刊》云：在南都不论富家贫户，皆会在家之入口处的庭院设置‘围炉里’，铺上厚厚的福蒿，一家男女主人一起在此招待来拜年的客人。另外，《嬉游笑览》云：正月的‘庭灶’习俗，往昔不仅在奈良，其他地方皆有此习俗。（中略）庭院新设围炉里的尺寸大小，因每个家庭的空间大小而定，并没有固定尺寸。全家人包括佣人家丁们都会围坐在炉边，一起焚薪烧烤饼蛤品茶饮酒，玩耍三日。^{[16]1202}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知，“围炉里”的尺寸并未统一，而是每家每户根据各自设置地炉空间大小而定，随机性非常大。

三、从中日两国风炉与地炉异同看日本茶道本土化发展特征

（一）日本茶道本土化的指针：融合和汉之境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虽然日本风炉与地炉的制作方法、形状、功能及文化理念等皆可溯源至中国茶道文化，但也确实并非对中国风炉与地炉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恰如村田珠光在给其弟子古市播磨法师的传书中所言“此道之一大事，乃融合和汉之境，此乃最为关键、最应该用心之事也”^{[18]3}，日本茶人将“融合和汉之境”作为日本茶道本土化的指针，进行了多种多样有创意的尝试。而且，日本茶人的创意并非停留在对“和物”与“唐物”的单调的拼盘，而是从东亚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日本历史文化风土的营养，并予以了重新編集。《南方录》“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时,宗易在集云庵,开示修习茶汤之法:茶汤虽以台子为根本,但终极安心之所,莫过于方寸草庵。常闻其言,但不明就里,遂询其详。宗易告宗启言:

方寸草庵之茶汤,乃以第一佛法修行得道之事也。以华丽家居、珍馐美饌为乐,乃俗世之事也。家能遮风避雨,食能果腹充饥,如此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汤之本意也。汲水,取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饮,立花,焚香,凡此种种,皆是在践行佛祖之行迹也。若欲详探究竟,则要靠你这个和尚勤勉修持、闻即信受的利根了。^{[12]3}

与从佛教逃离的陆羽不同,日本的茶人们恰恰相反,莫如说是以“第一佛法”为心之所依,将茶事修行等同于践行佛祖之行迹,以“融合和汉之境”为日本茶道本土化的指针,虽然以书院台子茶为根本,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很多创意,建构起终极安心之所的方寸草庵茶,以谋求日本茶道的本土化。其中,风炉与地炉可谓是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日本茶道本土化的创意。

(二)日本茶道本土化的方法、形式:哲理的具象化、宗教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日本茶道在其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其具体的做法与形式大体可以分为哲理的具象化、宗教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这样三个大的方面。

首先,关于哲理的具象化。如日本茶道中,通过“一个风炉、二文字押灰型、三爪五德”这样“融合和汉之境”的茶道具组合,将《道德经》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教思想予以具象化了。又如通过悬挂茶釜的自在挂钩、铁轮,将佛教中“自在德、炽盛德、端严德、名称德、吉祥德、尊贵德”的六德思想予以了具象化;特别是将易经后天八卦图具象化的四张半榻榻米茶室空间建构,更可谓是其典型案例。

且不论一尺四寸地炉尺寸与道教炼丹炉之间关系如何,以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空间来谋求对易经的后天八卦图予以具象化时,地炉显然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谓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具体言之,如图3所示,茶室的地炉由“炉坛”与“炉缘”构成。标准炉坛的外框整体大小为一尺六寸四分见方、高一尺三寸,炉坛内侧的深度为一尺一寸。装在炉坛上的“炉缘”的大小为一尺四寸见方、高二寸二分。后天八卦图的正中间为黄色,所以日本茶道规定地炉炉坛也都是用黄土打造。

也就是说,在日本茶道中,地炉不仅仅是一个用来生火烧水的重要道具,已经成为一个对东亚文化要素进行重新编辑的枢纽性道具。

接下来,关于宗教的生活化,恰如“茶禅一味”这句流行语所示,很多茶人从禅的视角将日本茶道视为“在家的禅”。另外,从礼仪的视角,仓林正次曾经指出,“初座—中立—后座”这一茶事结构的形成源于神道祭祀礼仪的“礼拜—宴座—稳座”祭礼模式^{[19]72-84}。日本的祭祀中也存在超现实的不可思议的世界。神人一体是祭祀的基本形态。礼拜—宴座—稳座,这三部分构成了祭祀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祭神”做法。在这一过程中,神与司祭者通过共同饮食来实现一体化,建构起神人一如的世界,这也是“祭神”的最终目的。古语称此为“镇魂”。仓林正次对茶事与镇魂礼仪的结构性类似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实,在“茶道教谕百首咏”中就有“不可触动焚烧剩余的白炭”的规定^{[20]136-137},日本茶道的“炭手前(即添炭礼仪)”也是最能体现这种镇魂礼仪的点茶法之一。尽管如此,茶道修行者平素训练时大概也很少有人会将“添炭礼仪”作为镇魂礼仪或者禅修行等来对待,而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来对待的。将这种宗教的、非日常的事情予以日常生活化,风炉与地



图3 四张半榻榻米茶室的地炉、炉坛、炉缘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炉的确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关于生活的艺术化,这个特点也是大凡对日本茶道有所了解者都比较容易理解的。日本政府2001年12月7日制定实施、2019年6月7日最终修订的《文化艺术基本法》第十二条中把茶道归属为生活文化之首。很多日本茶道研究者认为日本茶道的地炉来自于历史悠久的日本民俗——“庭灶”或称“围炉里次”,从前文所述日本古典文献记载可知,这些生活习俗也是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如果说日本茶道的很多做法确实与“庭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也恰好说明日本茶道正是通过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的“庭灶”艺术化,实现了日本茶道本土化的发展。中日茶人们对待“炭灰”的态度与做法,也可谓生活艺术化的一个代表性表达吧。此外,在茶人眼中,世上无弃物。生活艺术化的做法还体现在其他诸多茶道具等方面,就不复赘言了。

以上通过对中日两国风炉与地炉在制作方法、形状、功能及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上的异同点考察可知,在日本茶道中,风炉与地炉已经不再是单纯用来生火烧水的重要道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价值与功能,为日本茶道精神世界的重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后,无论是深入探讨茶道与道教的关系、茶道的人生观、茶道所蕴含的形塑新文明的力量,还是建构符合新时代的茶道,风炉与地炉的视角大概都不可或缺吧。

[参考文献]

- [1](日)神宫司厅古事类苑出版事务所编.古事类苑 游戏部5[M].东京:神宫司厅,1914.
- [2](唐)陆羽,著.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 [3](日)三谷良朴.和汉茶志[M].广岛:阪本武雄出版,1892.
- [4](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宋)张君房.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6](日)筒井紘一.知って得する茶道のいろは[M].京都:淡交社,2014.
- [7](日)三轮杉根.三木五百枝注释.宇治拾遗物语注释[M].东京:诚之堂,1904.
- [8](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書 家わけ 第十七ノ三 大徳寺文书之三[M].东京:东京大学,1954.
- [9](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七卷[M].京都:淡交社,1977.
- [11](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八卷[M].京都:淡交社,1977.
- [12](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四卷[M].京都:淡交社,1977.
- [13](日)松平直敬,述.境野文弥,编.茶道通解[M].东京:青山堂书房,1909.
- [1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清)吴之振,等.宋诗钞: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日)经济杂志社.日本社会事汇:下[M].东京:经济杂志社,1891.
- [17](日)温古谈话会.温古の刊:6篇—10篇[M].长冈:温古谈话会,1893.
- [18](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三卷[M].京都:淡交社,1977.
- [19](日)仓林正次.仪礼文化序说[M].东京:大学教育社,1982.
- [20](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十卷[M].京都:淡交社,1977.

责任编辑:戴方晨